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23.7.004

黄河、刘彦彤：“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7期，第45-58页。

HUANG He, LIU Yantong, “Geopolitical Risks and Its Effects on Overseas Interes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Pacific Journal*, Vol.31, No.7, pp. 45-58.

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对中国企业 海外利益的影响

黄河¹ 刘彦彤¹

(1.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摘要:当前,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动荡时期。地缘政治风险通常与相关国家、地区甚至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密切相关,地缘政治变局因此备受各界广泛关注。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国际形势和风险日趋复杂多变,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中,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分析方法,能够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中的政治经济互动进行深入探究,而结构性权力格局的不平衡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力。从结构性权力及其形成地缘政治风险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深受大国权力博弈的影响,同时与中国的海外战略布局紧密相关,并且越来越受到多方行为规则的限制。对此,中国应当继续强化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维度的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布局。

关键词:地缘政治风险;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结构性权力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23)07-0045-14

自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资本也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从数据看,2002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27亿美元,2022年则已增长至1168.5亿美元。经济全球化大趋势、“走出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正推动中国进入对外投资的新时期。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增多的同时,投资分布也越来越

广,涉及了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各类海外风险。由于海外投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加上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中国企业在海外各地区的机构、资金、人员都面临着程度不一的地缘政治风险。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生产、运营遭遇的极端风险事件不断增多,各界对我国海外利益保护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关注正在日益

收稿日期:2023-04-09;修订日期:2023-06-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中国引领世贸组织改革研究”(21AGJ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河(1969—),男,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刘彦彤(1996—),女,山东烟台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

*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提升。探究地缘政治风险的生成机制及其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影响有助于中国政府及企业更清晰地把握当前的全球政治格局和经济形势,从而建立健全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将风险带来的损失最小化。因此,深刻把握地缘政治风险才能帮助中国企业在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全球市场中趋利避害。

一、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形成机制

1.1 概念

地缘政治(Geopolitics)思想的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对人与其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探讨,其认知基础源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的形而上学学说。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斯特拉博(Strabo)、博丹(Jean Bodin)、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 W. F. Hegel)和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等许多西方政治思想家都对地缘政治理论的产生做出了贡献。古代中国曾出现过“地缘”的古代表达——“缘地”,指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及相互促进,缘起于地理位置关系。^①“地缘政治”一词的创造者——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②在地缘政治语境下,地理条件(很大程度上是物质性的)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③然而,地缘政治并非是一个具有固定涵义的术语,而是一个较为模糊且不稳定的概念。^④

不同时代影响地缘政治走向的因素存在巨大差异。从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角来看,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等早期地缘政治学家重视地理与空间,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拉采尔视国家为“地球表面上的特殊的空间组织”,^⑤“国家边界的扩张是一个民族的健康反映”,^⑥国家会经历动态发展的过程。契伦在此基础上指出,“国家的自然环境为权力单位提供了追求‘势不可挡的进步法则’”。从国家的全球战略

来看,麦金德(Thomas Makinder)、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马汉(Alfred Manhan)等人的研究跳出了狭隘的单一地理范围,强调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地形特征和自然资源等国家地缘政治客观要素的重要性。“心脏地带说”“新月地带说”“海权论”等学说对日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全球扩张战略影响深远。索尔·科恩(Saul Cohen)根据区域结构模式及特征划分空间,^⑦重视全球化下区域性的地缘政治因素。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则分别将文化和经济结构作为区域的划分标准。这种区域结构主义关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既然地缘政治对国家的生存、发展显得如此重要,并经常被视为一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地缘政治活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互动就成了一种常见的外交手段。由于地缘政治学说认为国家的权力以地理条件为基础,并受位置、空间、资源等地理因素限制,因此,追求有限空间、资源等要素的扩张便成为地缘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随着全球化和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大国的地缘政治活动已经扩展为对大陆、海洋、天空等空间主导权,石油、矿产、粮食等资源支配权和海陆通道、战略要塞等重点区域控制权的争夺。例如,早在冷战尚未结束时,美国就公开宣布要掌控全球16个重要海上咽喉,近年来又进一步宣称,

① 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② [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等译:《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③ Charles B. Hagan, “Geo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4, No.4, 1942, p.489.

④ Gearóid Ó. Tuathail, Gerard Toal, “Problematizing Geopolitics: Survey, Statesmanship And Strateg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19, No.3, 1994, p.259.

⑤ [英]罗伯特·迪金森著,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1-82页。

⑥ 蔡云龙、[美]Bill Wyckoff编:《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页。

⑦ [美]索尔·科恩著,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38页。

美军将全面控制印度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海峡和海域,保护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能源通道。^①

由于新兴国家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地缘格局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冷战的结束令一些民族、国家、宗教矛盾浮出水面,地区冲突与战争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对国际和平及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在增强。

学界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定义尚未达成统一共识。大卫·波尔(David Bohl)等学者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由暴力冲突、国家竞争、市场结构、自然灾害等导致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及自然风险。^② 达里奥·卡尔达拉(Dario Caldara)等人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会影响国际关系和平进程,引发战争、恐怖主义行为和国与国间紧张关系的风险。^③ 世界经济论坛(WEF)已经将地缘政治风险视为影响全球发展的五大风险之一。在其发布的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恐怖袭击、政权崩溃、国家间冲突、地缘经济对抗、多边机制的无效性六个方面,其中,政权崩溃、国家间冲突和地缘经济对抗所带来的风险影响最大。^④ 由此可知,地缘政治风险可理解为由地缘因素引发的国际政治风险。其中,地缘因素通常表现为资源、空间、权力的有限性,以及民族、文化、宗教、价值观的差异性。国际政治则强调地缘政治风险超越单个国家的界限,深受全球化、国际格局变动、地缘利益结构变化和大国博弈等的影响。^⑤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主要的地缘政治冲突几乎都发生在东亚、阿拉伯伊斯兰、欧亚大陆与海洋四大地缘战略板块的交界处。地缘政治风险是由多层次的地缘因素复合而成的。近几十年来,地缘政治风险来源的研究范围已经从传统的国家间关系拓展到地区内、地区间以及全球网络的多维互动,各种代理商的权力斗争事件,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叛军团体和政党等,也都可以被视为地缘政治风险的来源。^⑥ 整体来看,地缘政治在探讨国家安全与政治格局

的重构等权力空间时,更注重融合经济因素,对国家与跨国公司共同参与的市场整合等相关内容的关注不断增多。其生成机制可以从单元国家、地区及全球三个层次考虑。

1.2 地缘政治风险形成机制

具体而言,从单元国家层面来看,一国的政权崩溃与更迭、经济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变化、外交取向的变动都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外来投资国造成风险。首先,政局动荡是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以来,国家由于发生内战、革命、政策变动而导致政权崩溃与颠覆性更迭的现象并不罕见。在西亚、北非等地区,政局动荡时常发生,给在本国境内进行的投资建设活动带来消极影响。由内战、革命等形式引发的政局动荡往往会对本国发展的基础环境造成致命打击,破坏外来合作的基础条件。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政权更迭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新政府的建立往往伴随着新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这将会改变其他国家与之交往的政策环境。如果与某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或一项由外国公司发起的合作项目与当地政治矛盾关联度高,就很可能被新政府列为首要攻击目标。其次,一国的外交立场很可能会因为国内政党斗争或第三方大国介入而发生变化,当政府为了稳固政权或讨好某一方大国时,很可能会选择牺牲掉与相关国家的合作计划。例如,缅甸吴登盛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转变了对华态度,2011年单方面宣布

^① 杜德斌、马亚华、范斐、恽才兴:“中国海上通道安全及保障思路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15年第2期,第3页。

^② David Bohl, Taylor Hanna, Brendan R. Mapes, et al., “Understanding and Forecasting Geopolitical Risk and Benefits”, *Parde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utures*, May 2017, pp.7-8.

^③ Dario Caldara, Matteo Iacoviello, “Measuring Geopolitical Risk”,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12, No.4, 2022, p.1197.

^④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3”,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3,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Risks_Report_2023.pdf, p.10.

^⑤ 张晓通、许子豪:“‘一带一路’海外重大项目的地缘政治风险与应对——概念与理论构建”,《国际展望》,2020年第3期,第84-87页。

^⑥ 潘忠岐:“地缘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地缘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21-39页。

搁置中缅密松水电站合作项目。再次,政体、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也会对国与国之间的往来造成负面影响。对于企业来说,这种差异性很可能使其在海外的合作项目遭遇当地民众的敌视。

从地区层面来看,地缘政治风险还来源于地区冲突与战争。首先,部分地区由于历史仇恨、领土争端、宗教、民族矛盾冲突不断,给周边国家和外来合作项目带来了长期不稳定因素。如中东、西亚等地不同民族和种族交错分布,宗教信仰也存在很大分歧,导致冲突具有长期性、多发性、复杂化的特点。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多位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在地缘政治上,目前在欧亚大陆由东向西正逐渐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包括中南半岛、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地缘上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多个海外投资重点地区重合,增加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与此同时,不同地缘板块上的激烈冲突也会对具体投资项目的落实带来极大的风险。在后苏联空间,“德左”冲突、纳卡冲突、俄格战争、俄乌冲突等接二连三地爆发,大量矛盾由于主权和领土纠纷而难以解决。其次,冷战结束后难以完全根绝的恐怖主义正在破坏地区的发展环境和现代化进程。中东正面临着世界上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其地区一体化进程迟迟得不到发展,^①基础设施常年遭受武装威胁,挫伤了外来合作的积极性。再次,第三方大国介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激化地区矛盾的重要原因。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某些第三方大国会以“调解者”“秩序维护者”的姿态介入到地区矛盾之中。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平息矛盾,而是趁机谋取地缘利益。如俄乌之间的冲突在美西方的蓄意引导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苏联的“援阿”行动不仅令阿富汗深陷内乱的沼泽,还导致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外溢,造成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危机。

全球层面的大国竞争与博弈也是地缘政治风险的来源。首先,对传统地缘要素的争夺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控制具有地缘政治价值的地理空间,在

地区格局中建立起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优势地位。目前,大国争夺的目标地区已经不再仅仅限于传统地缘政治学说重视的“心脏地带”“新月地带”及海湾地区。二是控制海洋、资源、贸易、市场、运输通道等关键地理要素,服务于本国的战略发展目标。^② 伴随着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地缘政治争夺的内容也在扩展。新能源、低碳贸易、信息网络正在塑造未来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局面。^③ 气候变暖导致北极资源及航道开发成为竞争热点。^④ 其次,大国的战略竞争正在愈演愈烈。大国的战略竞争往往涉及对地位和空间的追求。^⑤ 近代西方大国通常通过占有海外殖民地来展现自身的权力地位。二战后,美苏通过在全球划分势力范围来开展激烈的竞争。冷战结束后,国际实力对比的相对变化引起了守成国对权力转移的担忧。北约东扩、“印太战略”都是美国出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而进行的地缘战略选择。^⑥ 在大国博弈的笼罩下,小国往往会做出倒向一方或“左右逢源”的选择。再次,大国竞争还体现为地缘经济的对抗。来自霸权国的经济打压是新兴国家面临的较为直接的地缘经济风险。这种地缘经济的对抗正深刻地体现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美国通过结盟、制裁、贸易战、科技战、供应链封锁等多种手段,给中国政府及企业带来巨大的地缘经济风险,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种风险正在迅速向全球扩散,波及到东南亚、东北亚、欧洲等多个地区。

① 张家栋:“中东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合作现状”,《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6期,第27页。

② 陆俊元著:《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1页。

③ 王礼茂、牟初夫、陆大道:“地缘政治演变驱动力变化与地缘政治学研究新趋势”,《地理研究》,2016年第1期,第4-6页。

④ 李振福、孙建平:“北极航线地缘政治的规范博弈机制分析”,《世界地理研究》,2011年第1期,第56-62页。

⑤ Karen Rasler, William R. Thompson, “Explaining Rivalry Escalation to War: Space, Position, and Contiguity in the Major Power Sub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4, No.3, pp.506-511.

⑥ 杨原:“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第21页。

二、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冲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许多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的推动下,加紧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537.1亿美元,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当年的20.2%。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有超2.8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设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5万家,范围覆盖全球80%以上的国家(地区),^①在外各类劳务人员约62.3万人。然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正在迅速蔓延至经济领域,伴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利润而来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尤其是对跨国企业的扩张战略和投资决策造成越来越重大的影响。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动荡,诸如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一系列风险因素正在深刻搅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加深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经济封锁、进出口检疫和国际边界的关闭增强了全球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因为供应链越长,生产环节越复杂,涉及的国家利益越多,所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②供应链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易风险正在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不得不因此面临更多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这些都导致中国企业境外活动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与日俱增。

2.1 海外市场规模萎缩

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直观表现在其海外市场的开拓上。由于经济发展与合作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企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大国战略博弈的漩涡之中。中国企业的风险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全球趋势2040: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中称,在未来20年,全球影响力的竞争可能会达到冷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中,中

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政治影响力、治理模式、技术优势和战略优势的竞争。^③由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地位的攀升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加,美国对华战略的考量已经转变为对中美间权力转移的担忧,^④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通过重塑全球供应链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逐渐清晰。^⑤美国政府对部分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了严厉的制裁,阻碍这些企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展的业务正常运作。美国证监会(SEC)加强了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查,并先后将包括百度、京东、拼多多在内的上百家中国公司列入“预摘牌”名单,导致这些公司的市值暴跌。2018年,美国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起诉了大量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研人员,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之路和海外市场的扩张。拜登政府在系统评估了美国关键产品与行业的供应链风险之后,^⑥将中美经贸“脱钩”聚焦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整体采取“小院高墙”的措施实施对华“脱钩”战略。一方面,在美国国内,陆续出台《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一系列法案,通过多边出口管制、限制中国技术投资以及限制人员参与敏感项目等手段,强化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与实体清单。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拜登政府大力推进“供应链外交”,试图以增强“供应链韧性”为旗号构建

①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页。

② 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43-152页。

③ “Global Trends 2040: A More Contested World”, A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rch 2021, 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GlobalTrends_2040.pdf, p.9.

④ Christopher Layne, “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119, 2012, pp.21-31.

⑤ 李巍、王丽:“拜登政府‘供应链韧性’战略探析”,《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第1-24页。

⑥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A Year of Action and Progres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Capstone-Report-Biden.pdf>, p.8.

经济联盟与科技民主联盟。^①通过构建“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将“供应链韧性”作为该框架谈判的重要谈判支柱以吸引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关键国家加入。2022年5月拜登访问日韩时,与日达成强化半导体、先进蓄电池等供应链的合作,与韩在事先觉察供应链混乱预警系统方面达成的合作,^②与此同时,美国东盟峰会还讨论东盟国家可承接的产业,试图形成从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型战略弧”以围堵中国。在新一轮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中,美国正在利用世界霸主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要求各国“选边站”。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正通过一系列政策促使跨国公司关键供应链迁离中国,实现本土生产及近岸生产。^③为了对抗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日、澳共同推出了基础设施新框架,在印太地区推动“蓝点网络”计划,提高准入门槛,对华展开“制度之争”,并企图令印度等国替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达成联盟内部的供应链互补合作。同时,美国大力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污蔑中国利用通信网络技术危害别国国家安全,以促成各国对华“脱钩”。

2.2 海外项目运行受阻

首先,第三方对东道国的制裁措施与中国企业关联密切。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欧盟国家在出口管制和禁运、经济制裁以及惩罚性关税等多个维度开展了多轮对俄贸易禁运和投资限制措施,并且开始将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与俄罗斯的相关交易作为后续禁运和制裁的重点。由于中俄的经济合作较为紧密,中国企业在开展在俄项目时面临的制裁风险较大。其次,在大国竞争背景下,部分大国会利用对象国政治转型的机会拉拢对方,以期淡化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而对象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加剧了海外投资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例如,政治转型成为了美国重返东南亚的突破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与缅甸实现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缅甸与中国的关系则明显趋冷,尤其以密松水电站突然被叫停为标志。而中国的其他投资项目包括皎漂深水港项目、中缅油

气管道项目则受此影响陷入僵局。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上台后,尽管从整体上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态支持,但在实践中对中方的相关合作项目态度暧昧。^④受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和内部政治纷争的波及,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建设也处处受阻。^⑤由于扼守印度洋运输要道,又是重要的军事要地,斯里兰卡政府既担心中方投资会危及其国家利益,又担忧该项目会引起美国和印度的不满,因此,曾于2015年暂停科伦坡港口城一期工程。^⑥

2.3 企业投资信心减弱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信心经济,因而塑造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维护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是其良好运作的必要条件。由于地缘政治风险具有多样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其爆发的时间和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不可预料的。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一般体现为东道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市场环境、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并会投射到市场的价格预期、金融市场的汇率预期及海外贸易合作上来,导致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如受2016年韩国“萨德”事件影响,2017年中国对韩国投资下降了60.5%,仅为8.09亿美元。受中印关系僵化及印度《外汇管理法》(FEMA)的变动影响,2020、2021年中国对印投资额连续两年断崖式下跌,两年复合增速同比减少66%。受南海争端的影响,中国的海上贸易格局发生了转变,为了稳定能源进口,中国的投资开始大量转向

①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gencies Are Taking Steps to Expand Diplomatic Engagement and Coordinate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February 2, 2023, <https://www.gao.gov/assets/gao-23-105534.pdf>, p.11.

② 马雪:“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的路径及困境”,《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0期,第26-33页。

③ 王健、张群:“中美博弈背景下周边战略环境变化与中国周边战略塑造”,《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期,第31页。

④ 李晨阳、宋少军:“缅甸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反应”,《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第25页。

⑤ 邹志强、孙德刚:“港口政治化:中国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建设的政治风险探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0期,第88页。

⑥ 彭念:“‘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投资海外港口的风险分析及政策建议”,《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第117-118页。

与南海事件无关的国家。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整体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剧烈变动,“去全球化”的风险正在影响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产业链的重构进程在进一步加快。由于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传统的劳动力、土地优势等东道国吸引外部投资的要素在跨国公司产业链调整过程中的地位会有所下降,企业可能会趋于保守,其海外投资将更注重长期稳定性和安全性,并更加关注地区格局、东道国国情及大国关系等地缘政治可能造成的影响力。

2.4 企业人员安全风险呈放大趋势

近年来我国海外项目的投资激增,带动了大量人员向外流动。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中国务工人员海外安全事件数量正在逐年上升。战争、动乱、恐怖主义袭击等暴力风险对人身安全的威胁最大。如2012年5月,在南海争端较为激烈的时期,数千越南不法分子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在越企业进行打砸抢烧,残忍杀害4名并打伤300多名中国在越公民。2015年11月,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公司的3位高管,在马里恐怖袭击中遇难。2019年5月,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瓜达尔地区发动了“5·11”恐袭,目标就是居住在当地酒店内的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中方人员。2023年3月,中非共和国一处采矿场遭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中国公民9人死亡、2人重伤。不断增加的安全风险令领事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也令企业的海外项目开展面临巨大挑战。

三、结构性权力与地缘政治风险的来源

企业的海外扩张并非单纯的市场拓展过程,而是伴随着一定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渗透。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直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严重制约。一方面,企业的海外运营必须受到国际规则和东道国法律法规等有

形要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深刻受到东道国文化、国际地区权力对比等无形要素的影响。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能够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中的政治经济互动进行深入探究。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起因来看,地缘政治学说的倡导者的目的基本都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扩张来实现国家利益。冷战后,权力的内涵趋于多样化。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理论给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个较为明晰的分析框架,通过在结构上分析国家与市场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①

斯特兰奇将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被界定为甲迫使乙去做不愿意做的事的权力,结构性权力则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②联系性权力通常与政治强权相关联,在地缘政治风险中,突出表现为大国使用暴力手段达成目的。如英国对清王朝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打开中国市场。结构性权力则是一种构建结构和规则的权力。由于国际结构与规则能够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分配及其扮演的角色,事关国际话语权,因此结构性权力对企业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更为长远而深刻。规则之争已经成为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美国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构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规则。

在结构性权力理论中,权力会通过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海外地缘政治风险会限制企业的海外投资选择,这种限制往往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结构密切相关。在当前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的海外投资与项目运作计划必须要结合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多

^①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8页。

^② 同^①,第21页。

重因素叠加考虑,涉及的主体也并非仅仅是企业,还包括多国政府、第三方机构等。因此,透过结构性权力的四个维度,能够更加全面地分析企业海外地缘政治风险的形成机制。

3.1 安全结构

安全结构是由一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护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提供安全的保护者因此能够获得某种权力,使他们得以决定、也许还能限制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并且会获得一些生产、消费及社会关系中的特权。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安全威胁主要源自权威性问题的,当“两个享有权威的单位因为彼此或明或暗地不同意平起平坐,或是权力较强的一方认为权力较弱的一方的行为已超过他可以容忍的限度”时,就很可能爆发战争,破坏安全结构。^① 由于国际机制和规则在解决安全问题时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民族国家对不安全的感知将不可避免地持续增长。

当安全结构遭遇两个行为体的权力斗争而不再稳定时,地缘政治风险就会随之产生。这种安全结构的不稳定首先来自于东道国内部的政权斗争与民族、文化分歧。具体来说,东道国的政权动荡所引发的社会动乱、政权更迭将不可避免地给企业带来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地矛盾的激化与经济停滞,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局动荡。中国的海外项目多集中在非洲、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此类地区和国家独立时间较短、发展水平较低,更容易爆发危及安全的地缘政治风险。企业的海外利益保护直接与当地政府的权威相关联,当东道国发生政权动荡时,政府往往会失去应有的保护者功能,并不能有效化解安全风险。此外,政权斗争及民族分裂主义的兴起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活动的土壤,如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民族主义分子一直将中巴经济走廊视为阴谋,多次将中国务工人员视为袭击目标,破坏工程建设的基础设施。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许多地区,面对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东道国政府并不能很好地提供安全防护,国际安全机制也

难以有效发挥防护作用。

安全结构的不稳定还来自于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的对抗。诸如俄乌冲突、印巴冲突、埃苏冲突等地区对抗势必会对中国的海外项目建设带来消极影响。东道国与母国的关系恶化也会干扰海外项目的运作,较为典型的就是2014年因南海问题引发的越南反华骚乱。

3.2 生产结构

生产结构是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生产安排的总和。全球生产结构的形成依赖于国家政策、市场趋势与技术变革,并越来越受到跨国企业的影响。^② 企业的海外项目包含生产、采购、销售等环节,十分依赖于全球和东道国的生产结构。随着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国内企业在行业领域和产品服务上的多样化,企业海外布局涉及的维度也越来越宽泛,当地生产基础设施情况、政策环境及各要素市场都会深刻影响企业的项目运行。部分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前并未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对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营商环境、产业及人才聚集情况等缺乏认知,导致项目推进受阻、或投产后收益不及预期。

全球竞争的激化和产业链的重构对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造成了生产结构的不稳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深刻调整,自由贸易机制亟需改革,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纷纷抬头。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加快推动关键产业回流重塑本国或相邻区域的产业链,将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重点放在盟国,推行“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战略,这正是运用在生产结构中的霸权推动“去中国化”,中国企业因此正面临国际市场恶化的巨大挑战。

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生产材料价格波动及

^①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4-45页。

^② 同^①,第68、85页。

相关产业的震荡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生产结构。如俄乌冲突及随之引发的对俄制裁正在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运行。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却掌握着大量生产制造所需的原材料。俄乌冲突后,乌克兰氖气生产工厂的停产直接导致全球氖气市场突然失去一半产能,而氖气是制造芯片的关键原材料。俄罗斯是钯金、镍等重要有色金属的主要生产国之一,钯对于内存和传感器芯片来说必不可少,镍是构成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关键原材料。持续性的战争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对中国海外汽车制造、手机制造基地造成较大压力。^①

3.3 金融结构

金融结构被定义为“支配信贷可获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的总和”。^② 全球金融体系自形成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反复动荡与崩溃的风险。尽管美国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的主导者,但它并不能发挥领导作用,维持金融结构的稳定。拥有独特地位的美元正是多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也成为了它们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趋于停滞,资本开始大量以短期商业贷款的形式流入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贸易进口的减少和加息的金融手段都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债务危机给西方大国重新介入发展中国家事务提供了机会,并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不稳定。^③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2)》就指出,中国海外投资的对象多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债务结构不合理,偿债能力并不稳定。^④ 在严峻的财务状况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很可能因东道国无法支付款项而流产。

大宗商品市场波动也会给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带来风险。如俄乌冲突及随之引发的对俄制裁正在影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正常运行,引起了相关大宗商品的全球供需错配,并导致全球股票、汇率、债券、商品市场的震荡。由于全

球尤其是欧洲大量依靠俄乌大宗商品出口,大宗商品的短缺会导致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给各国相关品种期货合约价格波动的风控增加了压力,对俄实施的金融制裁则带来了期货市场结算业务的风险,总体通胀率持续保持高位。金融市场脆弱性风险的加剧将对企业的全球融资环境造成冲击。

3.4 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包括信仰、观念、知识及其传送渠道,决定被发现的是什么知识、怎样储存,以及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⑤ 随着世界各国对知识产权、技术保护的日益重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专利壁垒和专利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当前,专利和技术壁垒已作为一项常态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被多国广泛采用,一旦侵权,侵权者不仅需要赔偿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损失,还将付出远高于侵权造成的实际损失的惩罚性赔偿。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执法力度存在差异,再加上缺乏对海外知识产权侵权风险规避措施的重视,知识产权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经常需要面临的一项难题。

知识结构的危险还来自于我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劣势。我国信息技术发展起步较晚,国外技术、产品价格优势明显,长期使用国外产品产生依赖,实现生产的“自主可控”是新发展阶段的重点和难点。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信息技术国产化替代在不同领域都取得了进展,如龙芯 CPU 服务器、飞腾 CPU 服务器以

① “乌克兰两家氖企停产致全球氖产量损失一半‘芯荒’恐加剧”,路透社,2022年3月11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raine-neon-output-chips-0312-idCNKCS2L9030>。

②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6页。

③ 周玉渊:“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政治化的影响与反思”,《国际展望》,2020年第1期,第87-89页。

④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61-65页。

⑤ 同②,第128-131页。

及申威 CPU 服务器对以 Intel 架构为代表的 CPU 的替代;国产 Linux 操作系统对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替代。但总体而言,国产信息化产品所占市场份额较小,技术上并未完全成熟。目前,美欧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广泛应用,将涉及关键技术和敏感信息的领域纳入审查范围,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审查的力度,限制企业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渠道。因此,中国企业在面临巨大的科技竞争的同时,其创新途径也深受限制。

四、中国企业海外利益格局的重构

传统地缘政治以地理位置和空间为核心要素,然而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空间距离被大大缩小了,地缘政治超越了传统地理空间的范畴,地缘政治风险也随之扩散到各个领域。依据结构性权力理论,权力并非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依托于安全、生产、金融 and 知识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属于提供安全的行为体、决定生产的行为体、能控制信贷和金融的行为体以及掌握了知识的行为体。因此,结构性权力更加隐性,导致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地缘政治风险更加错综复杂。

目前海外市场中的结构性权力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特征。一方面,由于拥有先发优势,权力集中存在于部分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手中,这些国家和企业掌握了大部分的先进技术、资金并能够控制生产资料的来源和产品的销售网络,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另一方面,权力格局并非一成不变的,新兴国家及海外投资的力量正在增强,部分结构性权力存在转移的迹象,但这种转移是有限的,南北差距依旧在不断拉大。由于知识结构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知识竞争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权力之争的重点内容。全球经济体系中结构性权力的高度集中,意味着掌握权力的少数国家和跨国公司能够将其结构影响力作用于海外市场和地缘政治的走向。

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从结构性权力及其

形成地缘政治风险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格局正在迅速走向重构。

4.1 地缘政治权力博弈的影响

国际权力博弈的影响将投射在多方外交关系上。正如斯特兰奇所述,公司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三种主体间的讨价还价:国家间为权力与影响而进行的讨价还价、公司间为世界市场的竞争而进行讨价还价,以及公司与国家间为使用生产财富的资源而进行的具体的讨价还价。^① 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的权力博弈过程中通常也包含中国与东道国政府、中国企业与海外企业、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等多组关系,由于经济权力经常被用于实现地缘政治目的,中国、东道国与第三方大国之间的三角关系也应当被纳入博弈框架中。

例如,全球供应链是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动力需求长期博弈的结果。在地缘上,中国的地理位置以及资源禀赋条件都决定了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像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这样的能源、商业咽喉影响着中国的进出口运输安全,关乎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在印太地区持续发力形成包围中国的战略弧体系,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关键领域构建供应链联盟,同时积极将东盟国家纳入这一供应链体系中,试图形成排他性的供应链,威胁中国的战略与经济利益。然而美国虽掌握着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一味减少对华供应依赖仍难以平衡弹性与效率,会削弱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中巨额研发投入和全球高端市场高回报率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② 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疲软的背景下,企业更倾向于节约成本的选择,并不会直接退出中国市场,这对人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产生了对冲效应。但随着中美竞争日益激烈,跨国公司仍不得不认真考虑中美关系未来继续恶化以至“脱钩”的潜在可能

^① [英]苏珊·斯特兰奇、约翰·斯托普福德著,查立友等译:《竞争的国家 竞争的公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7页。

^② 张杰:“中美经济竞争的战略内涵、多重博弈特征与应对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3期,第1-22页。

性,更多选择“中国+1”的多元供应链布局模式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如苹果公司已加速构建在印度的零部件供应链,生产其最新机型。^①而为了避免美国方面不必要的审查和抵制,许多中国初创企业选择将总部设在新加坡或香港。^②

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在多方博弈背景下,必须有目的性地向海外派遣具有丰富海外经验及高度地缘政治敏感性的关键管理人员,他们可以成为企业的敏锐触角,及时发现并提醒公司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为了让员工更好地应对当地的地缘政治环境,公司应该提供各种地缘政治事务相关的培训,邀请当地专家强化员工对风险的认知和防备,提高员工的紧急预警能力和应对能力。另外,公司应当考虑使用更多渠道获取信息,不再局限于主流媒体,在接收媒体报道与评论时更要学会鉴别虚假信息。

4.2 海外战略布局的影响

为了规避大国权力对抗的风险、保障独立发展的权利,中国的海外战略布局呈现向西走、向南行的偏好,较大比例集中在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尔及利亚等具有独特地缘政治价值的国家。这类国家大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虽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也给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带来了大量风险与挑战,当地政府往往没有足够的实力抵御各类风险,又极易受制于大国的权力干涉。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将对外援助与直接投资相结合的体系,通过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援外项目实行合资合作的经营方式,将政府资金、银行资金与企业资金结合起来,^③为我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开拓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企业投资的大部分国家民族、宗教、政党、文化等因素十分复杂,企业非本土化的运营模式往往会引发东道国民众的敌意,遭到当地人的排斥,也很容易受到所在国内部政治、社会剧变的影响。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提前做好当地背景调查和各项预案,并提高跨文化整合能力。当前,为了避免被大国对抗波及,企业可能会放弃以最低成本、最高生产力和其他绩效指标作为主要选址指标。

例如,为避开欧美国家的制裁,许多中国公司正在寻求与那些受地缘政治环境影响小的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必须综合考虑成本、效率、生产力以及生产销售网络等方面的因素,避免给海外经营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的便是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地缘战略。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并逐渐将视线投向一些转型经济领域,加强对新能源等绿色经济领域,科技、媒体和通信、先进制造与运输以及医疗与生命科学的海外投资和战略布局,并在欧洲、美洲和东盟等地区的海外市场均有扩展。但是中国在战略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尚存不足,美国在关键领域与中国脱钩断链、打压中国企业,对中国极限施压,势必冲击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进而影响中国企业进军海外高新科技领域市场的进程。中国在2020年提出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格局,正是希望“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推动供需良性互动,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④这需要中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放在科技发展上,并注重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往往将经济发展作为主要内容,企业通常将尽快完成项目进度作为首要目标,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的发展被置于经济关系之后。但面对复杂多发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还需更多重视政治与安全要素,将结构性权力的扩张纳入海外战略中,并更加关注

^① Sankalp Phartiyal and Saritha Rai, “Apple’s New iPhone 14 to Show India Closing Tech Gap With China”, August 23,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8-23/apple-s-new-iphone-14-to-show-india-closing-tech-gap-with-china?leadSource=verify%20wall>, para.2.

^② Karen Hao, Shen Lu, “Chinese Startups Try to Make It Big in the U.S.—but Without the Backlas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9,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ese-startups-try-to-make-it-big-in-the-u-s-but-without-the-backlash-11669706136>, para.3.

^③ 黄梅波、刘爱兰:“中国对外援助中的经济动机和经济利益”,《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4期,第64-65页。

^④ 刘鹤:“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人民日报》,2022年11月4日,第6版。

当地的实际经济需求。

4.3 国际行为规则的限制

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保护往往会受到两类规则的影响。首先,是来自于国内传统的行为规则的限制。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起步较晚,在现阶段相应法律制度仍然不够健全,并且许多规则并不能与飞速发展的世界形势相适应。例如,我国在对外交往中长期奉行“不干涉”的基本原则,在一国国内政权斗争、民族纠纷过程中基本采取中立态度。^①但是在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时局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要素交织在一起,一味反对干涉并不能很好地保护我国海外利益。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结构性权力优势推行的“新干涉主义”,中国若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改良国内固守的行为规则,很可能会丧失在海外利益保护领域的主动权。因此,中国应当整合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等各部门及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团体的力量,形成环环相扣的利益保护机制。在始终遵守国际法和各国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国内行为准则的完善,创新性地发挥“不干涉”原则的影响力。

其次,是来自于国际社会变化的行为规则的限制。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受阻情况下,各国开始将战略的重心转移至区域合作,加快签订具有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就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开展谈判,形成新的国际规则。这种新规则的大规模出现不仅会影响中企海外合同的签订、项目的运作以及最终的收益,也会给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带来新的难题。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投资监管正整体趋严,如美国出台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德国多次修订了《对外贸易和支付条例规定》、欧盟开始执行《欧盟外商投资审查条例》,增加了中企进行海外并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受规则变动影响,仅2018年,交易宣布后失效或撤回的中企海外并购就已达38宗。目前,中国对国际自由贸易和国际市场机制的理论研究还是以传统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为主,对新一轮

贸易自由化所具有的贸易与投资并重、侧重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趋势转型,以及CPTPP、DEPA等新型协定的理论研究和评估普遍不足。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必须分析当地在各领域合作、生产、运营、销售各个方面设定的各类新规则,时刻关注国际规则的新动态。

五、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的建议

无论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还是从当下实践来讲,地缘政治风险都会影响跨国资本的流向,从而塑造全球供应链。后疫情时代的供应链变革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俄乌冲突与中美竞争都表明大国新一轮地缘竞争日趋激烈,受政治关系不稳影响,各国愈发强调国家产业安全与供应链韧性,跨国企业在生产经营时不得不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考量。全球供应链在这样的背景下短期内将加速收缩,向发达国家回流,并朝地区性的盟国供应链方向重构。

这一机制并非单向传导,全球供应链是全球化时代变革国际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手段,可以反作用于地缘政治版图。由发达国家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驱动的全球供应链,虽并未能在国家间和国家内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但为一些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发展机会。随着经济实力增强,新兴经济体开始掌握部分高科技产业,拥有了引导国际分工再组织的能力,这冲击了发达国家对国际分工与利益格局的主导权,从而必然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理解这一逻辑,对发掘当前美国重塑供应链打压中国科技产业的背后原因、认识俄乌冲突的深层博弈以及最终描绘变革中的国际政治经济轮廓具有重要意义。

在严峻的海外风险环境下,中国政府日益加强了对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视。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① 梅建明:“论新时期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3页。

“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2015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将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列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并将海外利益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观,以理念指引实践。同时,中国政府也更加强调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防范,并在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场合中倡导开展化解各类风险的合作。在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在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近年来,中国建立起中央、地方、驻外使领馆、企业和公民个人“五位一体”的境外安保工作联动网络,创新立体式领事保护机制模式,多次更新《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先后颁布《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但应当注意到,目前我国企业的海外利益保护仍存在不足之处。在大国博弈与经济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中国及中企应当继续强化海外利益保护战略布局。

5.1 建立与完善海外投资预警机制

相关部门应当完善企业海外利益的保护和预警机制,建立起联通国内各部门机关、企业、非政府团体、中国驻外机构的网络体系,促使地缘政治风险预警等情报信息能够被各组织单位第一时间接收、共享、传递,以便做出及时的反应和行动。加快建设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关注全球及各地区大国以及相关国家的国内外动向,健全全国别风险评级体系,提升政府发布的《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等安全防范指南的可行性和具体化,并强化海外企业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提升其风险意识和应急能力。海外利益保护工作的推进需要东道国的积极配合,中国应当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与相关国家构建良好的外交关系,也需要加强与海外组织、民众的合作,如在2003年日本政府就与丰田、三菱、三井、日本海外安全协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及团体共同成立了海外安全公私合作委员会,保障日本公民的海外安全利益。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在海外投资计划签订和实施前,必须对东道国的国情做细致

全面的调查与了解,对可能爆发的地缘政治风险做出预判,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5.2 提供国际或区域性公共产品

中国企业的投资目标国众多且各国间发展程度各异,彼此间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条件也不尽相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既能够推动有关国家共同发展,又能为中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条件。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当继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治理,在原有金融机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扩宽中企的海外融资渠道。继续提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金融公共产品,“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①努力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来规避美元波动,降低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造成的损失。中国还应当建立多层次、有体系的安全类公共产品提供机制,如形成直接参与行动的各国军警队伍及相关协同配合机制,以及促成信息沟通、后勤保障、培训交流等国际合作制度,最大限度地实现海外安全合作,提高海外安全保障的效率。^②

5.3 分散项目投资的主体风险

企业可以通过合资经营或投保的方式分散和降低海外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可以寻求与当地政府、企业合作出资,聘请当地人才参与项目建设,有效分散项目的建设、运营风险。中国应当向西方国家学习海外投资保障的先进经验,建立健全对外投资风险担保机制,^③企业可以利用投保的方式转移部分风险,及时向中国出口

^①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全文)”,中国外交部,2014年11月15日, 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jyh_674906/201411/t20141115_7945285.shtml。

^② 黄河、黄越、赵琳菲:“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与‘一带一路’安全合作体系的建构——以中国企业在巴尔干地区的投资为例”,《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1期,第16页。

^③ 甄炳禧:“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国家海外利益——西方国家保护海外利益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6期,第54页。

信用保险公司投保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保障产品,或者购买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服务,还可以购买一定国外保险公司投保人寿、工程、石油天然气等相关险种。企业需要转变对外投资方式,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并进转变,从而形成国内对“一带一路”产业投资的整体合力,强化产业合作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5.4 创新企业海外经营战略

相互间的不信任和文化差异是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分析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受挫或失败的案例,其中不乏该类风险的身影,一些别有用心国家和组织经常故意散播“中国威胁论”“资源掠夺论”等论调抹黑中

国。因此,中企必须加强国家和企业形象的正面宣传。企业应当积极探索自己在海外的本土化经营战略,转变对中国政府及东道国政府的过度依赖,与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及媒体建立良好的联系。部分非政府组织具有较大的地区影响力,又与某些西方国家存在资金、人员上的联系,并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外媒体的舆论导向,值得被重点关注。中企在与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加强合作的同时,也要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为当地民众解决实际问题,通过企业责任的履行,在当地树立良好形象,实现企业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力争消除项目推进障碍和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

编辑 邓文科

Geopolitical Risks and Its Effects on Overseas Interes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HUANG He¹ LIU Yantong¹

(1.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world is in a turbulent period with frequent geopolitical risks. The geopolitical risk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of relevant countries, regions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and geopolitical changes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various stakeholders.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overseas investments of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risks faced by enterpris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variable, and geopolitical risks have become a signific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overseas interest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y observ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analytical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an b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s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s. Actually, the imbalance of structural power intensifies the effects of geopolitical risks. This paper hold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power and its geopolitical risk mechanism, the protection of overseas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business community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power game of major countries,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overseas strategic arrangements. Also, it is increasingly restricted by transnational rules. Thus,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capability of protecting the overseas interests in terms of the dimensions of security, production, finance and knowledge.

Key words: geopolitical risk; China enterprise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interests; structural power